

“深时”与教会的妥协：历史背景

约翰·惠特科姆博士关于创造的著作，如《创世记洪水》、《毁灭的世界》和《早期地球》，在我大学时期作为一名年轻的基督徒思考进化论和数百万年历史的挑战时，对我帮助极大。他对《以斯帖记》的精彩解读（《以斯帖记：上帝主权的胜利》）也令我受益匪浅。在三一福音神学院学习期间，我通过电话与他相识，此后我们多次碰面。几年前，我有幸与他在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创造论研讨会上共同讲道。在与他的所有交往中，他始终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位敬虔的人，一颗热爱上帝、荣耀上帝、敬拜上帝圣言的心，以及对丧失灵魂的深切关怀。作为近半个世纪以来少数几位坚定捍卫《创世记》1-11章真理的神学家之一，他一直是我莫大的鼓励。能为这本纪念这位基督忠实仆人的文集贡献一份力量，我深感荣幸。

地球和宇宙拥有数百万年（甚至数十亿年）的历史，如今已被公认为科学事实，不仅非基督徒认同，大多数基督徒，包括大多数基督教领袖和学者也认同。然而，这种对“深时”的广泛信仰却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因此，了解它是如何产生并被基督徒广泛接受的至关重要。

在探究这段历史之前，我们需要记住使徒保罗的话。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说：

我们虽然在肉身中行事，却不凭肉身争战。我们争战

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和一切拦阻人认识神的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哥林多后书 10:3-5）

保罗说我们正身处一场大战之中——一场思想之战。各种臆测（或如钦定版圣经此处译为“想象”）和高谈阔论与对上帝的认识相悖，因此也与上帝在祂的话语中所启示的真理相悖。保罗在警告歌罗西的基督徒时，进一步阐述了这些反圣经的思想：“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用哲学和虚空的欺骗，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的传统和世俗的小学，把你们掳去。”（歌罗西书 2:8）

保罗的警告并非徒劳。他深知基督徒极有可能被错误的思想所误导。保罗曾就此警告提摩太：“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称为‘知识’的争论。有些人自称有这知识，反倒离弃了真道。”

（提摩太前书 6:20-21）此外，文化同侪压力也不容忽视。在加拉太书 2:11-14 中，保罗描述了彼得如何屈服于这种压力，因惧怕人而陷入虚伪和隐晦地背离福音的行为。

当我们追溯这一思想数百万年的历史时，我们会发现它是源于反圣经哲学假设的推测和想象的产物。

当我们追溯这一思想数百万年的历史时，我们会发现它是源于反圣经哲学假设的臆测和想象的产物。我们还会看到，许多善良真诚的基督教领袖和学者都曾被

这一思想所蛊惑，这反过来又导致它在过去两百年间在教会中广泛传播。结果，这导致许多人偏离信仰，甚至陷入属灵的沉沦。

“深时”的起源

地质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领域，有系统的野外研究、岩石和化石的收集与分类，以及对形成这些岩层和岩石化石的历史事件进行理论重建，至今只有大约 200 年的历史。

在此之前，早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已注意到岩石中的化石。许多人认为化石是曾经的生物遗骸石化而成，许多早期基督徒（包括特土良、克里索斯托和奥古斯丁）甚至将其与诺亚洪水联系起来。但也有人否定这些观点，认为化石要么是大自然的玩笑，要么是某种意义上被赋予生命的岩石产物，要么是上帝的创造之作，甚至可能是撒旦的诡计。这场争论最终由英国博物学家罗伯特·胡克（1635-1703）通过对化石木材的显微分析证实化石是曾经的生物遗骸矿化而成，从而尘埃落定。

在 1750 年之前，最重要的地质学思想家之一是尼尔斯·斯滕森（Niels Steensen, 1638-1686），又名斯泰诺（Steno），是一位荷兰解剖学家和地质学家。在他的地质学著作《论固体中自然存在的固体》（*The Prodomus to a Dissertation Concerning Solids Naturally Contained within Solids*, 1669 年）中，

他提出了如今被广泛接受的叠置原理。该原理指出，沉积层是以连续的、基本水平的方式沉积的，因此下层沉积在上层之前（因此更古老）。他认为地球大约有6000年的历史，并且全球性的诺亚纪洪水沉积了大部分含化石的沉积岩层。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包括英国地质学家约翰·伍德沃德（1665 - 1722）和亚历山大·卡特科特（1725 - 1779）以及德国地质学家约翰·莱曼（1719 - 1767）在内的几位作者撰写了书籍，强化了这种年轻地球论和全球洪水论的观点。正如本书其他章节所记载的，这与教会前18个世纪的信仰是一致的。³

18世纪后几十年，一些英国和欧洲地质学家认为，岩石记录的形成是漫长地质过程的结果，而非洪水造成的。几位杰出的法国科学家也支持数百万年的观点。备受尊敬的科学家布丰伯爵（1707-1788）认为，地球的历史是由自然规律支配的。因此，他坚决否认圣经中诺亚时代的洪水。他在其著作《自然纪元》（1779）中设想，地球曾经像一个炽热的熔球（从太阳的物质中撕裂而出），经过七个纪元冷却，历经约75000年（尽管他未发表的手稿中记载约为300万年）才达到现在的状态。他还认为，最初的生命物质是在热的作用下，由“水性、油性和延展性”物质自发产生的。

天文学家皮埃尔·拉普拉斯（1749-1827）在其著作《宇宙体系的阐述》（1796）中提出了“星云假说”。该理

论认为，太阳系最初是一团炽热的旋转气体云，经过漫长的岁月逐渐冷却凝结，最终形成了行星。尽管这一推测性的假说（缺乏观测或实验支持）在当时被大多数科学家所否定，但如今它已成为大爆炸宇宙论的主流观点。1809年，贝壳类动物专家让·拉马克在其著作《动物哲学》中提出了生物进化论。当时大多数科学家（包括非基督教徒）都拒绝接受进化论，但这一理论为达尔文1859年出版的著名著作《物种起源》奠定了基础。拉马克设想的进化机制（获得性遗传）早已被证明是错误的。

19世纪初，随着地质学开始发展成为一门严谨的科学研究领域，地质学领域也出现了新的理论。

19世纪初，随着地质学逐渐发展成为一门严谨的科学研究领域，地质学领域也涌现出许多新的理论。亚伯拉罕·维尔纳（1749-1817）是德国一位颇受欢迎的矿物学教授。然而，正如一位地质学进化论史学家所言，“维尔纳倾向于教授教条式的理论和推测，很少顾及事实，似乎也几乎不考虑可验证的原理……他提出的观点主要基于假设。”⁵他那本仅有28页的矿物学著作《各种岩石的简要分类与描述》（1786年）中，有一小节阐述了他基于对家乡附近沉积岩的研究而提出的地球历史理论。他推测，地球的大部分地壳是由一个缓慢退缩的全球海洋在大约一百万年的时间里通过化学或机械作用沉淀形成的。这是一个简洁精妙的理

论，但维尔纳却未能仔细研究岩石中的化石。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化石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关于沉积物何时以及以多快的速度沉积并转化为岩石的信息。维尔纳是一位充满活力且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许多 19 世纪最伟大的地质学家都是他的学生。尽管他那套简单化的理论很快就被摒弃了，但他关于地球拥有极其漫长历史的观点却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学生。6

在苏格兰，詹姆斯·赫顿（1726-1797）发展出一套不同的地球历史理论。他曾在大学学习医学。毕业后，他一度接管了家族农场。但他真正热爱的是地球研究。1785 年，他发表了一篇期刊文章，1795 年又出版了一本书，两篇文章的标题均为《地球理论》。他设想，在漫长的岁月中，大陆被缓慢侵蚀入海洋。这些沉积物在地球内部热量的作用下逐渐硬化，然后因地壳运动而隆起，形成新的陆地，最终再次被侵蚀入海洋，硬化并隆起。因此，在他看来，地球历史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他曾发表过一句名言，这番言论招致了许多同时代人的无神论指责。他说，他无法在岩石记录中找到任何地球历史开始的证据，这使得地球历史无限漫长。此外，他对岩石中的化石也鲜有关注。

灾变论者与均变论者的辩论

乔治·居维叶（1768-1832）是一位对化石格外关注的学者，他是著名的法国比较解剖学家和脊椎动物古生物学家。在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他发展出了后来被

称为地球历史灾变论的理论。这一理论在其著作《地球理论》（1813 年）中得到了清晰的阐述。居维叶认为，在漫长而难以估量的地球历史中，许多区域性或近乎全球性的灾难性洪水摧毁并掩埋了生物，其中一些生物被保存为化石。根据居维叶的说法，除一次之外，所有这些灾难都发生在人类出现之前。他强烈反对拉马克的进化论，认为上帝在地球历史的不同时期以超自然的方式创造了不同的生物。

威廉·史密斯（1769 - 1839）是一位排水工程师和测量员，他在英国各地工作期间，对地层和化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与居维叶一样，他反对生物进化论，并持有地球古老灾变论的观点。在 1815 年至 1817 年间出版的三部著作中，他绘制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第一幅地质图，并根据某些特征化石（指示化石）解释了岩层的顺序和相对年代。他被誉为“英国地层学之父”，因为他发展了一种根据岩层中发现的化石来确定岩层相对年代的方法，这种方法至今仍被进化地质学家所采用。

鉴于灾变论者对教会的巨大影响，还有两位也值得一提。一位是威廉·巴克兰（1784-1856），牛津大学地质学教授，也是 19 世纪 20 年代英国首屈一指的地质学家。起初，他追随居维叶和史密斯的灾变论观点。与当时许多科学家一样，巴克兰也是一位英国圣公会

牧师。他的两位学生查尔斯·莱尔和罗德里克·默奇森后来成为 19 世纪 30 年代及以后极具影响力的均变论地质学家。在《地质学辩护》（1820）一书中，巴克兰论证地质学与《创世记》相符，通过提供创造和上帝持续眷顾的证据来证实自然宗教，并几乎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全球性的灾难性诺亚洪水确实发生过。然而，在巴克兰看来，洪水的地质证据仅仅存在于地表的沙砾层和大陆的地形特征中。他认为，数千英尺厚的沉积岩层（例如我们在大峡谷看到的）形成于洪水之前的数千年。为了使他的观点与《创世记》相符，他考虑过“日龄论”，但更倾向于“间隙论”，这两种理论都是在 19 世纪初发展起来的。在此过程中，他完全没有对《创世记》的文本进行任何分析，以证明地球年龄古老论如何与《圣经》相协调。他只是简单地引用其他地质学家或神学家的观点作为自己的权威。而且，和居维叶一样，他相信存在多次超自然创造，并认为人类的创造仅仅发生在几千年前。

三年后，巴克兰出版了广为流传的《洪水遗迹》（1823），他认为这是对洪水论的进一步辩护（尽管其对地质影响的论述有限）。虽然他讨论了表面上的地质特征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但他仍然没有回应圣经中关于洪水的记载。从巴克兰在 19 世纪 20 年代的私人信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他看来，地质证据在重建地球历史方面比文字证据更具质量和可靠性，因为文字记录容易

受到欺骗或错误的影响，而岩石是真实的，无法被人为篡改。¹⁰他并没有断言圣经文本有误，但他的这种论证方式无疑暗示了这一点。

亚当·塞奇威克(1785-1873)是巴克兰在剑桥的同行，于1818年获得地质学教席，当时他自称对地质学几乎一无所知。然而，他学习能力很强。他也是一位受过圣职的英国圣公会牧师，终其一生都坚持认为地球古老论与《圣经》并不矛盾。但无论是在他早期作为灾变论者，还是在他后来作为均变论者的大部分人生中，他都从未尝试过如何调和地质理论与《创世记》1-11章的文本。甚至连他是否持有间隙论、局部洪水论或平静洪水论来解释诺亚洪水都不得而知。还应该指出的是，塞奇威克在查尔斯·达尔文就读剑桥大学期间，曾帮助他接受地球古老论的思想熏陶。达尔文随后直接运用了这些与《圣经》相悖的思维方式，发展出了他的缓慢渐进生物进化论。1845年，罗伯特·钱伯斯发表了进化论，塞奇威克在一篇长达85页的评论文章中强烈反对，称其为“受虚假哲学之蛇缠绕影响的怪诞妄想”。¹²1865年，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年)出版之后，塞奇威克与其他616位签署者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年会上提交了一份声明。这些签署者表达了他们对达尔文的理论“质疑圣经的真理和真实性”的担忧。¹³因此，这位英国圣公会牧师兼剑桥大学教授(塞奇威克)通

过倡导古老地球地质学来削弱圣经，从而为达尔文进一步通过生物学削弱圣经铺平了道路，这令塞奇威克十分沮丧。

在巴克兰、塞奇威克等人的影响下，古地球灾变论（或有时被称为“冲积论”）地质学在 19 世纪 20 年代被大多数地质学家以及英国和北美的许多神职人员和神学家广泛接受。

莱伊尔……坚持认为，只有当今地质变化过程及其强度和幅度才能用于解释过去地质活动的岩石记录。

1830 年至 1833 年间，查尔斯·莱尔（1797-1875）——一位律师，也是巴克兰的学生——出版了他影响深远的三卷本著作《地质学原理》，这对灾变论造成了致命打击。莱尔的《地质学原理》复兴并扩展了赫顿的思想，阐述了他认为进行地质解释应遵循的原则。他的理论是一种激进的均变论，他坚持认为，只有当今地质变化过程及其强度和幅度才能被用来解释过去地质活动的岩层记录。换句话说，地质变化过程在地球历史上是均一的。莱尔坚称，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大陆或全球性的灾难性洪水。

莱伊尔的研究促使巴克兰在 19 世纪 30 年代初放弃了对地质证据的灾变论解释。他在 1836 年出版的著名两卷本《布里奇沃特地质学专著》中公开了这一观点的转变。书中，他仅用一个段落和一个简短的脚注，就将这场洪水描述为平静的，在地质学上微不足道。<sup>

14 </sup> 塞奇威克在 1831 年也公开放弃了他的灾变论观点，因为他同样接受了莱伊尔的均变论。

莱伊尔常常被过分夸大（或指责）其对创世记洪水和圣经时间尺度的破坏作用。但事实上，在莱伊尔的著作问世之前，许多自称基督徒的人（包括地质学家和神学家）就已经对圣经教义的这种削弱有所贡献。灾变论极大地降低了诺亚洪水的地质意义，并将地球历史扩展到远远超出传统圣经观点的范围。莱伊尔的著作无疑是对洪水信仰的最后一击。他用缓慢渐进的过程来解释整个岩层记录，从而将洪水贬低为一个地质上无关紧要的事件。灾变论并没有立即消亡，尽管到了 19 世纪 30 年代末，灾变论者寥寥无几，而且他们认为诺亚洪水在地质学上微不足道。

到 19 世纪末，所有地质学家都认为地球的年龄在数亿年之内。放射性测年法于 1903 年开始发展，在 20 世纪，地球的年龄被扩大到 45 亿年。

假设、观察和解释

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的是，地球古老论（例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后来的宇宙大爆炸理论）并非“让事实自行说话”而发展起来的。理解观察与解释之间的区别至关重要，同时也要认识到哲学/宗教假设在观察、决定收集哪些数据并向科学界报告以及如何解释数据方面所起的巨大影响。

“深时”理论的构建者并非公正客观的真理追求者。

历史上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人，而科学家们由于受过学术训练，往往对影响他们观察和解读的哲学性、非科学性假设视而不见，这些假设也影响着他们开展的实验类型、探索的问题类型以及最终得出的结论。一位受人尊敬的科学史学家曾就 19 世纪早期地质学指出：最重要的是，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的最新研究表明，当科学家构建（岩层的）分类时，将自然世界转化为可理解形式的概念框架就显得尤为明显。以往的经验、早期的训练、机构忠诚度、个人气质和理论观点都会影响对特定边界的“自然”定义。 ¹⁵

我们还必须补充其他可能扭曲科学家思维或其已发表成果的因素：同侪压力、贪婪、嫉妒、对金钱或名誉的追求等等，都可能导致欺骗和欺诈，而这些行为可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难以被科学界发现。 ¹⁶然而，认为所有这些因素对所有科学家的影响程度都相同，则是误导性的，也是错误的。此外，任何人的理论观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宗教世界观（可能包括无神论或不可知论）。世界观对古老地球地质学起源的影响远比人们通常认为或承认的要大得多。一个人的世界观不仅影响其对事实的解读，也影响其对事实的观察。另一位著名的科学史学家对科学家和非科学家都做出了恰当的评论：“人们常常看到他们期望看到的东西，而忽略他们不想看到的东西。” 17

著名地质史学家马丁·鲁德威克对 19 世纪 30 年代末英国地质中关于泥盆纪地层归属的争议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描述。他写道：

此外，他们记录的大多数与泥盆纪地层争议相关的实地观察，不仅或多或少带有“理论色彩”（这是大多数科学家、科学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现在普遍接受的简单意义上的理论色彩），而且还带有“争议色彩”。这些具体的观察及其在实地的直接安排，往往明显是为了寻找不仅与争议相关而且具有说服力的经验证据。许多看似最“客观”的观察，从其语境来看，实际上都是为了强化观察者的解释并削弱其反对者的合理性而精心寻找、选择和记录的。¹⁸

莱伊尔暗中推广斯克罗普对法国中部地质的均变论解释时，他曾在 1827 年说过类似的话：“几乎无需提醒读者，那些想要确立某种理论的人很容易忽略与其理论相悖的事实，并且由于缺乏对自身偏见的认识，只关注那些支持他们观点的论据。”¹⁹然而，当时和现在许多地质学家都会认为，莱伊尔在自己的地质解释中忽视了这一事实。

因此，世界观对地质事实的观察、选择和解释的影响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十分显著的，尤其是在 19 世纪早期地质学尚处于萌芽阶段，人们个人和集体的知识都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正如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所指出的那样：

科学哲学家们反复证明，对于给定的数据集，总可以构建不止一种理论框架。科学史表明，尤其是在新范式发展的早期阶段，提出这些替代方案甚至并非难事。20

关于地球年龄以及如何正确解读地质记录的争论核心，是一场巨大的世界观冲突。

19 世纪初，哲学假设推动了地球年龄古老理论的发展。其中两个关键假设是：（1）物理宇宙中的一切都可以而且必须用时间、偶然性和作用于物质的自然法则来解释；（2）自然物理过程始终以与我们今天所见相同的方式、速率和强度运行。这些假设构成了均变论自然主义的基础，该理论在 19 世纪初主导了现代科学，比达尔文 1859 年发表《物种起源》早了几十年。尽管如今许多科学家在其地球历史模型中允许偶尔发生大规模灾难，但均变论思想仍然根深蒂固，自然主义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关于地球年龄以及如何正确解读地质记录的争论，其核心是一场巨大的世界观冲突。

许多 18、19 世纪的地球年龄论支持者都明确表达了他们的自然主义均变论世界观。例如，布丰写道：

为了判断已经发生的事情，甚至将要发生的事情，只需考察正在发生的事情……每天发生的事件，接连不断重复的运动，持续不断的重复运作，这些就是我们的原因和理由。21

布丰在其他地方还辩称：

……我们必须如实地看待地球，细致地考察它的各个部分，并运用归纳法，根据现在存在的事物来判断未来。我们不应受那些很少起作用，且其作用总是突然而剧烈的原因所影响。这些原因在自然界的正常进程中并没有立足之地。只有那些规律性重复的运作，那些不间断地连续发生的运动，才是我们推理的基础。²²赫顿也曾写道：“我们星球的过去历史必须用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来解释……任何非地球自然的力量都不能被运用，任何我们不知道其原理的行为都不能被接受。”

²³他在其他地方也驳斥了全球性洪水的说法，理由是“不能用现在的情况来推断过去：“但可以肯定的是，普遍的洪水并不属于地球理论的一部分；因为，地球的目的显然是为了维持动植物的生命，而不是为了毁灭它们。”²⁴当然，现在的地球确实养育着动植物，而且今天也没有全球性洪水。但这并不意味着过去没有发生过全球性洪水。

显然，这些人坚持地质学家只能根据已知的、现今的自然过程进行推理，从而先验地（即在观察岩石和化石之前）排除了上帝在六天内超自然地创造世界，以及《创世记》中描述的由超自然力量引发的、持续一年之久的全球性灾难性诺亚洪水。沃纳、拉普拉斯、史密斯、莱伊尔和其他一些古老地球论的主要倡导者都遵循了这种自然主义的均变论推理。令人遗憾的是，

许多基督教地质学家（例如英国的巴克兰和塞奇威克，美国的本杰明·西利曼和爱德华·希区柯克）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影响，而他们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难怪这些地球古老论的支持者看不到大量地质证据证实了圣经关于创世、洪水和地球年龄的教导。同样不足为奇的是，过去两百年来接受相同预设教育的所有地质学学生也看不到大量证实《创世记》的证据。其余公众（对这些预设视而不见）很容易被地质学家（通过媒体、博物馆、国家公园标牌、学校教科书和电视科学节目）引导，从而接受数百万年的说法。

地质学家中的反圣经态度

地球古老论的创立者不仅受到上述各种因素的影响，他们的自然主义（自然神论或无神论）思维方式也是在欧洲公开基督教文化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他们有意拒绝《圣经》（至少是《创世记》）的结果。这种反圣经的世界观常常被刻意隐藏在那些表面上承认上帝存在的作品中。但这些人未发表作品则更为直白。布丰敏锐地意识到他的地球古老论不会被天主教会接受。因此，尽管他未发表的手稿估计地球的年龄为三百万年，但他出版的著作却给出了七万五千年的年龄（这同样令天主教神学家难以接受）。20世纪法国著名科学史学家雅克·罗杰指出：“布丰是最早创立独立科学，摆脱任何神学影响的人

之一。” 25 当然，有洞察力的基督徒会意识到布丰并没有这样做。相反，他想让科学受制于他自己不符合圣经的神学，并将科学从基督教框架中“解放”出来——而基督教框架正是现代科学的摇篮，也是现代科学理解世界的根基。

居维叶对圣经真理的反对更为隐晦。在他的《地球理论》中，他简要提及了《创世记》、创造、洪水和上帝，但却否定了所有先前试图用这两个事件来解释地质记录的努力。他本人并未尝试将自己的理论与圣经历史联系起来，只是暗示洪水后的圣经年表可以为洪水的发生时间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但他没有具体引用任何经文，并且忽略了《创世记》1-9 章和《出埃及记》20:8-11。

均变论地质学家查尔斯·莱尔在 1832 年于伦敦国王学院的一次演讲中解释道：

我一直对一位杰出的作家兼技艺精湛的地质学家的一番话印象深刻，他说：“为了启示，也为了科学——为了各种形式的真理——地质学研究的物理部分应该像圣经不存在一样进行。” 26

如果圣经没有描述任何与地球岩石形成相关的事件（例如创世周和洪水），那么这种推理或许还说得通。但既然圣经确实提到了这些事件，莱尔的做法就好比试图通过研究现存的古迹、建筑、艺术品和钱币来撰写古罗马史，却故意忽略可靠的罗马历史学家的著

作。这样的结果自然不会十分准确。

几年前，莱伊尔曾私下透露了他对《圣经》的敌意以及他企图破坏其教义的阴谋。在 1829 年 8 月 11 日写给他的朋友罗德里克·默奇森（一位同样信奉地球年龄古老论和均变论的地质学家）的一封信件中，莱伊尔透露，就在他出版《地质学原理》（1830 年第一卷）的几个个月前，他写道：

我相信我的地质学发展概述会广受欢迎。老弗莱明牧师（约翰·弗莱明）感到害怕，认为时代无法接受我反摩西律法的结论，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这个话题会变得不受欢迎，令神职人员感到尴尬，但我并不害怕。我会把所有内容都公之于众，但会尽可能以和解的方式进行。²⁷

大约在同一时期，莱伊尔与他的朋友乔治·P·斯克罗普（另一位地球年代学地质学家，英国国会议员）通信，称：“如果说有什么方法能不冒犯地记录下摩西的地质学，那一定是写成历史概述。”²⁸

莱伊尔为何要将地质学中关于洪水的历史准确（或受神启示的）记载剔除呢？因为作为一名一神论者（或自然神论者），他反抗着他的造物主耶稣基督，他希望地质学能够以自然主义的前提来运作。1830 年 6 月 14 日，莱伊尔再次写信给斯克罗普，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想法：

我相信您或许能在《季刊评论》（Quarterly Review）

上发表文章，探讨如何将地质学从摩西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如果认真对待这个问题，教会方面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一位主教，据巴克兰（Buckland）证实（我们推测是约翰·萨姆纳[John Sumner]），曾在《英国评论与神学评论》（British Critic and Theological Review）上对尤尔（Ure）29的论述进行了抨击。他们终于看到了摩西体系给他们带来的危害和丑闻……或许一切有始有终——这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值得神学家探讨——或许一切终将终结。正如您所说，物种有始有终——但这类比微弱而遥远。或许这的确是一种类比，但我只想说明，正如赫顿（Hutton）所说，“既没有开始的迹象，也没有结束的迹象”……我只要求，在过去的任何时期，当被“开端”的说法所困扰时，不要停止探究，因为在我看来，开端与“另一种自然状态”完全一致。但你攻击我并无不妥，只要你指出我否认的是开端的证据，而非开端的可能性……我不敢像你在《古兰经》中对摩西那样，过多地指出其中的寓意。或许我对《古兰经》应该更温和一些。最好不要过多地干涉它。如果我们不惹恼他们（我担心我们可能会惹恼他们，尽管这只是历史），我们最终会把所有人都带走。如果你不战胜他们，而是赞扬当今时代的宽容和坦诚，那么主教和开明的圣徒们也会和我们一起鄙视古代和现代的自然神学家。现在正是出手的好时机，所以，即使你是个罪

人，也要庆幸二维码为你敞开大门。

附言……我五六年前（1824-1825 年）就萌生了这个想法：如果要把马赛克地质学描述出来而不冒犯任何人，那应该以历史概述的形式，而你们必须从我的描述中抽离出来，这样你们自己才能尽量少说。让他们自己去感受，然后指出其中的寓意。³⁰

通过对莱伊尔著作的研究，波特得出结论：莱伊尔自视为“地质学的精神救星，将这门科学从摩西时代的旧秩序中解放出来”。³¹因此，许多早期地质学家暗中策划如何动摇人们对圣经的信仰，尤其是对创世记 1-11 章历史的解读，并试图说服教会，圣经与地球的年龄和历史问题毫无关联。这些地质学家在实现其目标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

科学源于对世界本质的哲学探究，它已经取代了以前宗教所包含的一些神秘性。”

但考虑到对古老地球理论发展影响最大的几位人物的神学倾向，这一切也就不足为奇了。布丰是自然神论者或无神论者，他偶尔提及上帝来掩盖这一事实。³²拉普拉斯是公开的无神论者。³³拉马克则游走于自然神论和无神论之间。³⁴维尔纳是自然神论者³⁵，也可能是无神论者，³⁶因此他“觉得没有必要让自己的理论与《圣经》相协调”。³⁷

历史学家对赫顿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³⁸ 威廉·史密斯是一位模糊的有神论者，但据他的侄子（一位地质学家）所说，他绝对不是基督徒。³⁹ 居维叶名义上是路德教徒，但最近的研究表明，实际上他是一位不敬的自然神论者。⁴⁰ 莱伊尔很可能是一位自然神论者（或者是一位一神论者，两者本质上是一样的）。⁴¹ 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许多其他著名地质学家也同样反基督教。因此，这些人并非如他们希望同时代的人所相信的那样，也并非如现代进化论者和许多科学史学家希望我们看待的那样，是公正客观的真理追求者。进化古生物学家菲利普·金格里奇坦率地承认：“科学源于对我们世界本质的哲学探究，它已经占据了曾经属于宗教的一些神秘领域。”⁴²

神学家和圣经学者需要理解这一点。柯林斯在简要讨论地质学后，为了部分捍卫其地球古老论的观点，发表了如下言论，但他的观点大错特错：

首先，现代地质学的确不依赖于圣经（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无视圣经：许多著作都引用了詹姆斯·乌舍尔的世界年表）。但这与说现代地质学与圣经对立相去甚远。事实上，19世纪初英国的大多数地质学先驱都是虔诚的英国国教徒——其中一些人还是神职人员。只有当我们确信圣经要求我们相信世界是年轻的，才能说地质学与圣经相悖——而早期的地质学家认为圣经允许

其他可能的解释。43

这种说法极具误导性。少数提及《圣经》或乌舍尔的现代地质学著作，都带有或明或暗的嘲讽。它们绝不会认真对待《圣经》的教导或乌舍尔关于年代学的学术著作。此外，19世纪早期那些主张地球年龄数百万年的神职人员兼地质学家（例如英国圣公会的威廉·巴克兰、亚当·塞奇威克和威廉·康尼比尔）从未从《圣经》文本中证明他们对地球历史的看法与圣经相符。他们只是凭着自己的权威断言，古老地球理论与圣经之间并无冲突。因此，他们或许在道德生活、虔诚的教会活动以及对基督为救世主的信仰方面是虔诚的，但在对待（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忽视）《创世记》中上帝的话语方面，他们却并非虔诚。

在简要讨论了史蒂夫·奥斯汀（年轻地球创造论地质学家，拥有博士学位）和G·布伦特·达尔林普尔（著名进化地质学家）在放射性测年方面的工作之后，柯林斯以如下陈述结束了他关于地质学的简短章节：

关于放射性测年法和地球年龄问题，双方都有很多技术细节，我并不妄称自己懂得如何评估它们。然而，我可以肯定地说，达尔林普尔⁴⁵对待那些与他意见相左的人是公平的——他阅读了奥斯汀的资料，并用合理的专业标准对其进行了评估。他认为奥斯汀的资料存在缺陷，因为它不符合这些标准。因此，在我看来，奥斯汀质疑放射性测年法的说法在我们看来并不具有

多大分量。由此，我的结论是，我没有理由不相信地质学家们的标准理论，包括他们对地球年龄的估计。就我所知，他们或许是错的；但即便他们错了，也不是因为他们不恰当地将哲学假设偷偷塞进了他们的研究工作中。46

正如我们所见，柯林斯对哲学假设在地质学中的影响力存在严重误解。令人费解的是，柯林斯承认地质学家对地球年龄的判断可能存在偏差（就他所知），但他却愿意让那些地球年龄古老的地质理论（他承认自己没有资格进行技术评估）影响他对圣经的解读；而且，他还拒绝接受那些相信圣经的创造论地质学家的论证，而这些论证恰恰证明了这些地质理论的错误之处。一位优秀的旧约神学家，坦言自己没有接受过地质学或地质学史方面的训练，却告诉基督徒，年轻地球创造论地质学博士的论证对基督徒来说无关紧要，这实在令人遗憾。

基督教对古老地球地质学的回应

19 世纪上半叶，教会对灾变论者和均变论者的古老地球理论做出了各种回应。英国（以及少数美国）涌现出一些被称为“圣经地质学家”的作家，他们从圣经、地质学和哲学的角度对古老地球理论提出了反驳。他们当中有些人是科学家，有些人是神职人员。在当时，既受过圣职又具备深厚的科学素养的人很常见。以当时的地质学标准来看，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具备相当的

地质学知识，这得益于他们丰富的阅读以及对岩石和化石的细致观察。他们认为，圣经中关于创世和诺亚洪水的记载比古老地球理论更能解释岩石记录。19世纪初，其他47位基督徒很快接受了数百万年的说法，并试图将所有这些时间塞进《创世记》的某个地方，尽管均变论者和灾变论者仍在争论，地质学作为一门科学还处于起步阶段。

1804年，年轻的长老会牧师托马斯·查尔默斯（1780-1847）开始宣扬基督徒应该接受地球已有数百万年历史的说法。他断言：“摩西的律法书并不能确定地球的古老程度。如果说它们确定了什么，那也只是人类物种的古老程度。”⁴⁸1814年，在对居维叶的灾变论《地球论》的评论中，他提出所有的时间都可以包含在《创世记》1:1和1:2之间。⁴⁹那时，查尔默斯已成为一位极具影响力的福音派领袖，因此，这种“间隙论”变得非常流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查尔默斯是一位牧师，但他直到1811年才真正因信基督而重生，而这距离他接受数百万年历史的说法已经过去了七年。⁵⁰皈依基督教后，他从未质疑过地球古老的信仰。

1823年，一位受人尊敬的福音派圣公会神学家乔治·斯坦利·费伯（1773-1854）成为“日龄论”的早期倡导者之一，该理论认为创世的“日”并非字面意义上的，而是象征漫长的岁月。⁵¹他受过时的地质

学著作影响，错误地认为化石的排列顺序（正如古地球论地质学家所呈现的那样）“以一种极其奇特的方式证实了” 《创世记》第一章中创世事件顺序的“严格准确性”⁵²。他的论证表明，他对圣经的解读深受古地球论的影响。他承认教会历史上曾相信全球性洪水，但他因地质学的原因而否定了这一观点，并接受了居维叶的灾变论地球历史观。⁵³ 他荒谬地辩称，既然上帝仍在休息，停止祂的创造工作，那么创造周的第七天就没有结束，“实际上与被创造宇宙的持续时间相称”。⁵⁴

所有这些观点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一致认为，洪水与解释数千英尺厚的沉积岩层的起源没有任何关系。为了接受这些地质年代，基督徒也必须重新解读《创世记》6-9章中的洪水记载。我们已经提到过巴克兰和塞奇威克等灾变论者。1826年，长老会牧师约翰·弗莱明（1785-1857）在一篇文章中反驳了巴克兰等人的观点，他认为诺亚洪水非常平静，没有留下任何持久的地质证据。⁵⁵ 弗莱明在否定洪水的灾难性本质时，并没有具体提及《创世记》叙述的细节。这种“平静洪水论”在当时并不像公理会神学家约翰·派·史密斯（1774-1851）的局部洪水论那样流行。他认为洪水是美索不达米亚山谷（今伊拉克）的一次局部性洪水。⁵⁶ 19世纪30年代末，莱伊尔的均变论取得胜利后，那些仍然相信洪水是灾难性事件的人转

而接受了局部洪水论。所有这些观点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认为洪水与解释数千英尺厚的沉积岩层的成因无关。

自由神学在 19 世纪初主导了欧洲教会，并在 19 世纪 20 年代开始在英国和北美蔓延。自由派认为《创世记》1-11 章与古巴比伦人、苏美尔人和埃及人的创世和洪水神话一样，在历史上既不可靠也不科学。因此，显然，它对理解地球地质毫无用处。尽管圣经地质学家们做出了努力，但这些对《创世记》的各种古老地球论的重新诠释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以至于到 1845 年左右，所有关于《创世记》的注释都放弃了圣经年表和全球洪水的说法。⁵⁷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 年）出版时，年轻地球论在教会内部基本上已经消失了。从那时起，大多数保守的基督教领袖和教会学者都接受了地球已有数百万年历史这一科学事实，并坚持认为地球的年龄并不重要，因为在他们看来，圣经对此只字未提。许多其他虔诚的信徒也很快接受了进化论。篇幅有限，我只能举几个例子。浸信会“布道王子”查尔斯·司布真（1834-1892）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地球古老地质学理论（尽管他显然没有意识到地质学家们是以数百万年为单位来思考的）。他在 1855 年的一次布道中说道：

谁能告诉我万物之始？多年前，我们以为世界的开端是亚当来到世间之时；但我们发现，在此之前的数千

年，上帝就已经在预备混沌的物质，使其成为人类适宜的居所，并将各种生物安置于此，让它们死去，留下他创造的痕迹和奇妙的技艺，之后他才开始创造人类。⁵⁸

在司布真一生中，他的讲道中从未持续关注进化论和地球年龄的问题，也从未解释过如何解读圣经以将漫长的地质年代纳入其中。他寥寥几句简短的论述表明，他反对达尔文进化论，称其为谎言。⁵⁹然而，在 1876 年，他的论证是基于人类被创造之前存在数百万年历史这一既定事实。⁶⁰

普林斯顿神学院的长老会神学家查尔斯·霍奇（1797-1878）在其著作《什么是达尔文主义？》（1874）中强烈反对进化论，他认为进化论是一种无神论理论。然而，他接受了数百万年的时间跨度。早年他倾向于间隙论，但在 1860 年后，他转而支持日龄论。他断言，圣经没有教导我们关于地球年龄或人类年龄的信息，但几乎没有提供任何论证。⁶¹与他的父亲一样，A. A. 霍奇（1823-1886）接受了深时论，但他更进一步，探讨了上帝或许利用进化过程创造万物的观点。⁶²他还得出结论，圣经中的历史只能追溯到亚伯拉罕的时代。⁶³

B. B. 沃菲尔德（1851-1921）接替霍奇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首席神学家。学生时代，他是一位热忱的进化论者，但在其学术生涯中，他对进化论的观点摇摆不定，

令人困惑。他的相关著作的编者称他为“保守的进化论者”。⁶⁴ 鉴于他认为亚当和夏娃的身体可能由自然过程产生（当然，是在上帝的旨意之下），⁶⁵ 其他人则称他为“有神论进化论者”。⁶⁶ 至于“深时”，他不接受地质学家们最乐观的估计，但他相信存在数百万年，并倾向于“日龄”观点。他认为《创世记》中的家谱没有时间上的准确性，因此认为从亚当到亚伯拉罕的时间更接近 20 万年，而非 2000 年。他说，圣经中的家谱“简而言之，极具弹性，可以灵活地延伸以适应任何合理的时间要求。”⁶⁷ 尽管霍奇、霍奇和沃菲尔德出于好意且拥有真诚的福音派信仰，但他们的妥协最终促成了沃菲尔德去世后普林斯顿自由神学的胜利。⁶⁸ 福音传道者查尔斯·坦普尔顿（Charles Templeton）的悲惨属灵结局（后文将讨论）便是其后果之一。

C. I. 斯科菲尔德在其 1909 年出版的《斯科菲尔德参考圣经》中，将“间隙论”写入了对《创世记》1: 2 的注释里。这一论断在 20 世纪对全球数百万基督徒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只是一个简单的断言，没有任何论证来支持。为了捍卫正统基督教，对抗当时席卷教会的自由神学挑战，斯科菲尔德于 1909 年出版了 12 卷本的《基本要义》。这套书共 68 篇文章，其中大部分至今仍值得一读。然而，其中有四篇是关于

科学的，它们都妥协于“数百万年”的说法，接受了地质学家的观点，而对《创世记》的文本细节却鲜有关注。

1945年，穆迪圣经学院（后任富勒神学院）备受尊敬的圣经教授威尔伯·史密斯（Wilber Smith）撰写了一部捍卫基督教信仰的巨著《因此，站立得住》（Therefore, Stand）。他在序言中警告说，基督徒不应“与我们文化中这些不可知论和怀疑论的倾向妥协”。然而，在他长达86页的创世论章节中，他却恰恰违背了这一原则。他完全忽略了诺亚洪水，接受了当时主流地质学家关于地球数百万年历史的说法，并转而支持“日龄论”的创世观。他还坚称圣经中没有教导地球的年龄（尽管他忽略了创世记中的家谱、数日的记载以及反复出现的“有晚上，有早晨”的经文，还有出埃及记20:8-11中上帝对创造的阐述）。他确实拒绝了达尔文进化论，因为有科学证据表明物种是固定的⁷¹，而且上帝在创造亚当和夏娃之后，于创世周结束时完成了祂的创造工作。但是，尽管他学识渊博、阅读广泛，他却错误地告诉读者，相信6000年前的创世论是“中世纪的断言，没有任何圣经依据”⁷²。最近，已故的格里森·阿彻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从对《创世记》第一章的粗略解读来看，似乎整个创

造过程发生在六个二十四小时内。如果这真是希伯来作者的本意……这似乎与现代科学研究相悖，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地球是在数十亿年前形成的…… 73

同样，布鲁斯·沃尔特克也断言：

创世的“日”也可能给严格的历史叙述带来困难。当代科学家几乎一致否定了一周内创造世界的可能性，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否定地球科学的证据。74

并非地质证据或现代科学研究使《创世记》第1章的字面解释不可接受。

然而，并非地质证据或现代科学研究使得对《创世记》第一章的字面解释不可接受，正如这些原本优秀的旧约教授所认为的那样。过去几十年里，许多基督教学者和领袖都发表过类似的言论，足以表明他们对《创世记》的解读，如同过去两百年来他们的前辈一样，受到地质学家已证实数百万年历史这一假设的制约或影响。结果，世界各地的大多数基督教学院、大学、神学院和宣教机构都接受了数百万年历史的说法。但是，正如他们的著作清楚地表明的那样，过去两个世纪以来，这些受人尊敬的学者和领袖显然没有充分考虑数百万年历史的神学含义（例如，堕落之前人类死亡），也没有理解地质学中那些非科学的哲学假设（均变论和自然主义）。75 与他们的初衷相反，他们接受了那些暗含且严重削弱圣经权威的观点。

关于这一点，古老地球论支持者的历史叙述也需要修

正。戴维斯·杨（Davis Young）是加尔文学院的前地质学教授，他影响了许多神学家接受数百万年历史的观点。他曾就 19 世纪早期古老地球论支持者发表过如下评论：

当代教会若能重新发现史密斯、希区柯克和米勒引人入胜的著作，必将受益匪浅。这些人对《创世记》的具体诠释或许有待商榷，但值得称道的是，他们并没有将日益增多的圣经外证据——这些证据与传统的洪水论截然相反——视为信仰的威胁，而是将其视为加深对《创世记》理解的契机。⁷⁶

对此，需要指出的是，约翰·派·史密斯牧师的极简释经法已被圣经地质学家乔治·杨牧师从圣经和地质学的角度驳斥。杨牧师通过阅读和地质实地考察，对地质学的了解远胜于史密斯。⁷⁷爱德华·希区柯克和休·米勒的释经工作也同样寥寥无几。然而，如果他们对上帝话语的释经如此容易受到批评（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基督徒为何要相信他们对地质记录的解释（地质记录的解释远比圣经中命题性的真理陈述要困难得多），尤其是在这些解释严重依赖当时其他地质学家的解释，而这些地质学家的解释前提与圣经相悖的情况下？戴维斯·杨几十年来一直主张，应将世俗的、反圣经的地质证据解释视为事实，并以此重新解释圣经文本。此外，史密斯、希区柯克和米勒去世后的几十年表明，这些古老地球理论确实

对信仰构成了威胁，因为许多曾经正统的教会、神学院和教派现在都变得自由化和背离了正统信仰。

杨格本人也在慢慢滑下这条危险的滑坡。在他学术生涯早期，也就是 1977 年出版《创造与洪水》（这本书对许多神学家影响深远）之时，他相信一场全球性的、平静的洪水，没有留下任何持久的地质证据。这种不合逻辑的观点本质上将洪水变成了一个神话。

⁷⁸到了 1995 年，杨格放弃了这种观点，开始论证洪水发生在中东地区。⁷⁹此外，多年来他还提倡“日龄论”。1990 年，他承认几年前就已悔改，因为这种观点涉及“对经文的篡改”和“诠释上的花招”。但这种所谓的悔改并没有让杨格像教会 18 个世纪以来那样相信《创世记》是字面意义上的历史。相反，杨格提倡一种完全不合逻辑的观点，即《创世记》1-11 章“可能是用非事实的语言来表达历史”。

80 他这样说是因为“篡改圣经文本似乎并不能使其与科学数据相符”。因此，像大多数地质学家和非地质学家一样，他把一些实际上是基于反圣经预设的对数据的解读，贴上了“数据”的标签。任何一位笃信圣经的基督徒，应该信任这样一位地质学家（即使他自称是福音派信徒）的推理和“悔改”吗？

妥协没有必要

过去两百年来基督教的种种妥协，其令人悲哀的讽刺之处在于，近半个世纪以来，《创世记》1-11 章的真

理日益得到证实，而这往往要归功于那些嘲笑上帝圣言的进化论者。莱伊尔的均变论原理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一直主导着地质学，直到英国著名地质学家德里克·阿格（1923-1993）和其他进化地质学家开始对莱伊尔的假设提出质疑。⁸¹他们认为，大量的岩层记录显示出快速灾难性侵蚀或沉积的证据，这大大缩短了许多地质沉积物的形成时间。阿格这样解释了莱伊尔对地质学的影响：

我之所以要长篇大论地、略显业余地谈历史，是因为我一直试图阐明，我认为地质学是如何落入那些理论家（阿格尔在此指的是均变论者）手中的。这些理论家受当时社会和政治历史的影响远大于他们实地考察的成果。正如史蒂夫·古尔德所说，查尔斯·莱尔“成功地让后世地质学家相信，他们的科学是从他开始的”。换句话说，我们不知不觉地被洗脑，从而回避任何涉及极端和所谓“灾难性”过程的过去解读。⁸²

现在，显而易见，如果莱伊利式的均变论洗脑使人们看不到任何灾难性过程的证据，那么他们也肯定看不到《创世记》中描述的持续一年的全球性洪水的证据。因此，作为一位拒绝接受诺亚洪水这一受圣灵启示、绝对无误的历史记载的人，新灾变论者阿格尔继续坚持认为地质学无法证实洪水的存在。他看不到，是因为他不想看到。正如保罗所说，人们“用不义压制真理”（罗马书 1:18-20）。

这些对岩石的“新灾变论”式重新解读与“洪水地质学”的复兴几乎同时出现。“洪水地质学”对岩石记录的解读与 19 世纪圣经地质学家的解读非常相似，也是年轻地球创造论的关键要素。年轻地球创造论的兴起，主要归功于约翰·惠特科姆博士和亨利·莫里斯博士于 1961 年出版的《创世记洪水》一书。如今，这一运动已遍及全球⁸³，其科学模型的复杂性也在迅速提升⁸⁴。基督教学者和其他领袖有责任了解日益增多的科学证据，这些证据证实了《创世记》的字面意义。认为创造论者不是真正的科学家，没有从事真正的科学研究，这是一种无知或歪曲事实的说法。附录中推荐了一些解释验证《创世记》的科学证据的资源。我特别想提请大家关注约翰·莫里斯的《年轻的地球》和唐·德扬的《成千上万，而不是数十亿》（以及同名纪录片 DVD）。

妥协的灾难性后果

19 世纪初的圣经地质学家反对地球古老地质理论，不仅因为这些理论反映了错误的科学推理，与圣经相悖，还因为他们认为，基督教若与此类理论妥协，最终将对教会的健康及其对丧失世界的见证造成灾难性的影响。英国圣公会牧师亨利·科尔写道：

然而，许多受人尊敬的地质学家却通过区分神圣启示的历史部分和道德部分来表达他们对神圣启示的敬畏；他们认为，只有道德部分才是受神启示的绝对真理，

而历史部分则不然；因此，历史部分可以随意进行哲学和科学的解释、修改甚至否定！按照这些不敬神、不信教的人的说法，神的话语中没有三分之一是受神启示的；因为神的话语中，抽象的道德启示、教诲和诫命所占的比例并不多，甚至可能更少。因此，其余三分之二的內容可以随意进行科学的修改和解释；或者（如果科学需要的话）可以完全否定！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凡在人前公开否认启示中任何部分是受神启示的人，在神看来，就是完全否认启示是受神启示的……对于一个拥有启示的国度而言，此类事件的后果究竟会是怎样的？时间将在其开篇篇章中迅速而可怕地揭示出来，届时将出现民族怀疑、不信和背教，以及上帝对这一切的公义惩罚！ 85

科尔和其他反对地球古老论的人正确地理解并警告说，圣经的历史部分（包括创世记 1-11 章）是圣经神学和道德教义的基础。如果圣经历史的可信度遭到破坏，迟早（可能需要几十年）我们会看到教会内外都对圣经的神学和道德观遭到摒弃。欧洲和北美曾经的基督教国家后来的历史证实了圣经地质学家们对教会和社会的担忧。

教会，尤其是教会的领袖和学者，是时候停止无视地球的年龄和日益证实上帝圣言的科学证据了。

无数悲剧案例中，查尔斯·坦普尔顿（1915-2001）便是妥协数百万年历史（在许多情况下也包括进化论）

所导致的后果之一。作为葛培理的同代人和朋友，许多人认为他是一位比葛培理更有天赋的年轻福音布道家。他曾在北美和英国向成千上万的人传道，带领许多人归向基督。但他对进化论抱有疑问。20 世纪 40 年代末，他前往普林斯顿神学院寻求答案。然而，当时这所曾由正统的霍奇、霍奇和沃菲尔德三兄弟执教的神学院，已深陷自由神学的泥潭。坦普尔顿的教授们说服他必须接受进化论和数百万年历史，从而摧毁了他对圣经这本奠基之书的信仰，并动摇了他对福音的信念。神学院毕业后，他又传道几年。但最终，破碎的信仰迫使他离开牧师岗位，转行从事新闻工作。他于 2001 年去世，生前是一位痛苦的无神论者。但在 1996 年，他出版了《告别上帝：我拒绝基督教信仰的理由》一书。在该书的结尾，他写道：“我相信不存在具有人类属性的至高存在——不存在圣经意义上的上帝——而是生命是永恒进化力量的结果，经过数百万年的演变，最终达到了如今短暂的状态。”

86

错误的观念会带来可怕的后果。教会，尤其是其领袖和学者，是时候停止无视地球的年龄以及日益印证上帝圣言的科学证据了。教会必须悔改其对数百万年历史的妥协（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诺亚洪水的忽视或否定），并再次相信并宣扬创世记 1-11 章的字面真理。